

東方主義的另一面

• 郭 建

德利克 (Arif Dirlik) 在《二十一世紀》1996年10月號上發表〈世界資本主義視野下的兩個文化革命〉一文，主張從後現代的角度認識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國際背景、歷史意義及其對當代社會的啟示。德利克認為文革的實質在於對抗資本主義和現行社會主義的現代性，並指出毛澤東思想中的反現代傾向，這一點不失為敏銳的觀察。但作者把文革對現代社會的挑戰視為真正革命的標誌，這倒是很值得商榷的。

作為專事中國現代革命史研究的學者，德利克試圖從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的角度討論文化革命的意義，以「指向文革發展政策的革命根源」。在德利克看來，中國的現代革命史——從早期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和延安根據地力求自給自足的成功實驗，到社會主義時期自力更生的精神、工農結合的實踐、消滅城鄉差別的主張，以至於政治掛帥（以便塑造一心為公、為人民服務的新人）的口號和學大寨運動——集中體現出一種重視地

方、群眾和集體的傳統，即真正的民主傳統。在這一傳統中，「『人民』既是發展的驅動力，也是發展的目標。按此路線構思的發展，不再由專家當家作主，而是以『人民』為發展過程的核心。……政治上，這過程需要以日常原則來參與集體決策，為草根階層通過民主方式參與社會生活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契機」。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正在於清算新政權本身的官僚主義和精英意識對這一民主傳統的背叛，同時教育民眾以塑造能夠堅持這一傳統的新人，使社會主義不斷得到新的發展。因此，文化革命即「整個中國革命的具體表現」①。

正是基於這種對中國革命獨特性的認識，德利克認為文革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就當時的第一和第二世界而言，文革是對以官僚主義、精英主義和群眾邊緣化為特徵的現代性的直接挑戰：它「不只直接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政體，也對抗社會主義統治集團」，從而「大大幫助了中國向全世界推廣她的社會主義模式，用以抗

德利克認為文革的實質在於對抗資本主義和現行社會主義的現代性，並指出毛澤東思想中的反現代傾向，這一點不失為敏銳的觀察。但作者把文革對現代社會的挑戰視為真正革命的標誌，這倒是很值得商榷的。

衡原來的蘇式社會主義，為世人渴望以民主社會主義來對抗獨裁社會主義提供答案」^②。就當時的第三世界而言，文革理論表達了殖民地國家「在非殖民化過程中而得的授權意識」，林彪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中「把中國革命（以農村奪取城市）的範式套用到世界各國上」便是明顯的例證^③。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德利克認為文革理論，尤其是以「地方運動」為重的「民主社會主義的革命遺產」，或「毛主義對於社會的革命性的構想」，對解決當代資本主義的國際格局造成的問題尤其具有啟示性。也就是說，着力發展「地方社群」，進而建立以地方為基礎的跨國聯盟，由此便可以架空國家的方式「與世界資本主義的『虛幻社群』分庭抗禮」^④。

德利克關於中國革命獨特性論述中的某些觀點，承襲了中國黨內理論界對毛澤東思想的傳統看法。戰爭年代毛澤東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和他一向堅持的重視農民運動、建立和發展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早已被列為毛澤東將馬列主義與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例證。這一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作為一個天才的農民革命家，毛澤東比其他中共領導人更了解中國農業社會的結構和農民的經濟、心理狀況以及由此而決定的中國革命成功的途徑，這一點已被1949年以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所證實，毛澤東因此在黨內曾享有很高的威望。戰後，毛澤東對蘇聯的「正規化」官僚體制、專家路線以及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向提出懷疑，主張以農業為基礎自力更生，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於他對中國農業社會基本特點的認識，並非沒有可取

之處。但是，像德利克那樣把毛澤東思想中的這些反現代性因素——即對現代工業化進程的懷疑，以及由此懷疑而產生的對現代性的不同選擇，以至於發動文革以實現這一不同選擇——視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因素則是大錯特錯了。對文化大革命有切身體會的人都知道，文革對現代社會的反抗並不意味着向民主社會的邁進；恰恰相反，當時的政治鬥爭利用了中國人民的民主熱情，褻瀆了人們對共產主義的天真的信仰，為封建的狂熱、盲信和專制披上了革命的外衣。這一抗拒並超越現代的嘗試，在實質上是對歷史的反動。

中國近期慘痛的歷史教訓已經證明，作為毛澤東反現代性基礎的農民意識——更具體地說，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烏托邦意識——不可能超越其自身的局限，不可能排除其內在的封建因素。受到德利克讚賞的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delinking)的方針自然與追求自給自足的小農理想有關，在這種烏托邦的背後便是封建的閉關自守。這種幻想在現代有多少可能性已不是一個問題。我們都記得中國以既無內債又無外債自豪的時候，國力衰竭到何等程度。毛澤東對現代知識份子的不信任和對國外思想意識的本能的懷疑，也反映了狹隘的農民意識。舉例來說，正是基於這種意識，毛澤東無視現代社會的基本常識，對馬寅初關於控制人口的建議不屑一顧，執意相信「人多（勞力多）好辦事」，這一句話造成的嚴重後果是人盡皆知的。

再說文革。掃蕩舊文化是文革的具體目標之一，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社會自辛亥革命以來最封建的時期。我們記得文革

中國近期慘痛的歷史教訓已經證明，作為毛澤東反現代性基礎的小農經濟烏托邦意識不可能超越其自身的局限，不可能排除其內在的封建因素。像德利克那樣把毛澤東思想中的這些反現代性因素視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因素，明顯是大錯特錯的。

前夜毛澤東對中國「江山變色」的憂慮。他指示黨內高級幹部閱讀「觸龍說趙太后」，擔心高幹子弟受溺愛、有特權、很難成材、無法接班，最終會重複「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悲劇。在這段指示中，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前途的憂慮無疑是真切的，他堅信自己是一個真正的、關懷中國和世界前途的共產主義者。然而，可怕的正是這種不加思索的「堅信」，因為由此他便排除了自察自省（或曰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的必要性，進而無法意識到也不願意看到這段「最高指示」在字裏行間隱現的農民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意識。文化大革命期間，諸如感恩戴德、偶像崇拜之類的封建、宗教文化泛濫社會、深入人心，其狂熱程度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實際上，以「東方紅」為代表的擁戴救世主的文化在中國革命史上由來以久，毛澤東對此也不僅僅是默許。林彪正是因投毛澤東所好，鼓吹個人崇拜，編印發行「紅寶書」，從而在文革初期青雲直上成為「副統帥」。文革造就的「新文化」的標誌之一，就是這種封建救世主文化的登峰造極：當時不僅有三呼萬歲、叩迎聖旨的舊套，還有早請示、晚匯報、吃憶苦飯、跳忠字舞之類宗教儀式的新發明。而且，文革時期封建法西斯專政（「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的殘暴程度遠勝於中國歷史上的焚書坑儒和文字獄。

鑒於中國近期歷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所顯示出的封建特徵，德利克的「民主」社會主義顯然不能正確地描述60年代的中國。「人民」在官方話語中早已是一個空虛抽象的概念：在每一個具體的個人的尊嚴和權利得不到承認的情況下，所謂「人民當家作主」

只有為極權統治裝點門面的宣傳價值。這就是為甚麼德利克所說的政治上的「集體決策」和「草根階層通過民主方式參與社會生活」只見於《人民日報》，在現實中充其量不過是走形式而已。到文化革命時，連形式都被掃蕩殆盡。眾所周知，當時「集體決策」在中共中央內部早已成為空談，毛澤東有指鹿為馬的無限權威，他和那些拿「紅寶書」當護命符、整天擔心會被點名批判的高級幹部之間的關係不過是君臣關係。至於在基層或「草根階層」，群眾對社會生活的「參與」從來都是以「擁護毛主席的英明決策」、「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的方式出現的。正如金觀濤和劉青峰所見，無論是延安整風、鳴放反右還是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作為一種政治鬥爭的形式和手段，通過批判對立面、將馬列主義道德化，以純化無產階級立場的群體修身為目標。其結果總是使毛澤東思想成為黨的思想、群眾的思想，從而確立毛澤東一人的絕對權威^⑥。這裏哪有民主的立足之地？

德利克把中蘇的對抗看成是「民主」與「獨裁」兩個社會主義模式的對立，這同樣不符合歷史的真實。50年代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蘇聯出現了政治和文化上的「解凍」現象。在蘇聯，這雖稱不上民主的先聲，但至少是對獨裁專制的削弱。與此同時，中國以「反右」為開端的一系列黨內外政治運動此起彼伏，與毛澤東意見不同的人，包括他的老戰友彭德懷在內，受到打擊和壓制，最後終於造成毛澤東一人獨裁的局面，由此導致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就中蘇理論之爭來說，儘管毛澤東對蘇聯以官僚、精英為核心的政治經濟體制有看法，但他對1956年2月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

德利克把中蘇的對抗看成是「民主」與「獨裁」兩個社會主義模式的對立，這樣的論斷與歷史的真實不符。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其中出現的個人迷信、偶像崇拜、殘暴和專制遠遠超過蘇聯30年代的大清洗，與德利克所說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相距千里。

報告以及同年中共八大反對個人迷信和專斷、提倡集體領導的精神十分惱火，這兩者之間的聯繫對毛澤東來說是顯而易見的。60年代由毛澤東授意起草的「九評」為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論上的準備，「九評」的要點之一即是為斯大林辯護。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類似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解體的情況在中國發生。這場運動中出現的個人迷信、偶像崇拜、殘暴和專制遠遠超過蘇聯30年代的大清洗，與德利克所說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相距千里。

如上所述，毛澤東作為一個農民革命家，的確在中國革命的初級階段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中的某些理論運用於農業社會。但是，無論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還是基於「五四」的文化傳統，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必將是「現代化」的。「五四」傳統的進步性在於它反對中國由來已久的排外自大心理和近代滋生的殖民地情結，明確主張吸收西方啟蒙傳統中的科學精神和民主觀念，藉以對內批判封建文化，對外抗拒帝國主義霸權，進而探索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途徑。由於中國共產黨在其早期發展中吸收了「五四」傳統中的先進因素，「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實施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並得到了知識界的支持。但是，毛澤東本人的反現代意識使他最終不能接受「五四」的現代性，這一點在50年代後期和60、70年代表現得尤為突出：對經濟和科學發展的重視常常被毛澤東看作是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挑戰，而自由民主的觀念則更是資產階級的「遮羞布」。毛澤東在他最後的二十年中所做的事，可以說是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以「五四」傳統為代表的現代性，以至於馬克思主義本身的

現代性，發動全面的挑戰。具體來說，他不僅把中國社會中的民主呼聲，甚至黨內的不同意見，當作「階級鬥爭」的動向而鎮壓下去，而且針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中有關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決定作用以及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述，搞出一套政治文化決定論，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試圖抗拒並超越現代社會。毛澤東自以為這套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林彪則進一步將它吹捧成「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頂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將這套理論付諸實踐，結果使得整個社會陷入了黑暗。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一場以抗拒並超越現代為目標的政治運動恰恰證明了現代性在當代中國的價值。文革時出現的登峰造極的偶像崇拜、專制、盲信、狂熱以及新的等級和血統觀念（或稱「階級成分論」）對人性的嘲弄和摧殘，使我們看到「五四」批判封建文化的目標還遠遠沒有完成，中國社會仍然亟待確立理性、人性、自由、民主的價值，以及維護這些價值的體制。在這一現代化進程中，以反抗和批判封建文化為出發點的啟蒙主義仍然具有真正革命的意義。

然而，啟蒙主義現代性在當代中國的價值正是德利克所不願意承認的。應當指出，德利克的觀點在西方激進左派和後現代理論界有相當的代表性。這種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看法的形成，至少與以下兩種政治偏見有關。首先，以反叛現代主義為自己正名而獲立言之本各種後現代理論，曾對啟蒙傳統作過清算，認為既然理性、人性、正義及自由民主等「宏大敘事」已在西方的現代進程中自行消解，這種消解便應在世界上任何一個

毛澤東在50年代後期和60、70年代所做的事，可以說是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以「五四」傳統為代表的現代性以至於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現代性，發動全面的挑戰。對經濟和科學發展的重視常常被毛澤東看作是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挑戰，而自由民主的觀念則更被視為資產階級的「遮羞布」。

地方都具有普遍意義。從這一後現代的視角觀察中國，西方左派批評家自然把以抗拒和超越現代性為最終目標的文化大革命看作「政治文化的典範」^⑥，進而忽視了中國社會特定的歷史和文化環境，拒絕承認現代性在當代中國的價值，因此也就看不到文革在中國歷史上的反動性。其次，西方激進左派以批判資本主義、維護社會主義這一脫離歷史社會環境便毫無意義的政治偏見為出發點，只從理論的角度大談文革的革命性和世界意義（文革的確打出「社會主義」的旗號和資本主義對抗；在這個意義上，文革世界性的直接體現並不在60年代的西方，而在70、80年代的柬埔寨。然而，由於某種很明顯的原因，「紅色高棉」的殘暴已很少與其效法文革、鏟除「資本主義」禍根的動機相提並論），而對文革時期駭人聽聞的狂暴和恐怖往往不着一字，或只以「囿於歷史環境的局限，人類對解放的渴望不可避免地導致悲劇」一語帶過^⑦。以上兩個錯誤的要害都在於完全以西方為中心，無視中國的歷史經驗和社會環境，而將文革時期的中國作為印證西方理論的「他者」。

德利克在分析西方社會詆毀中國文化大革命各種原因時，曾提到東方主義所扮演的角色：「東方主義不承認中國社會是真正變動不居的，反而固守一種落後的文化心態，不斷尋找證據支持在它眼中各種僵化的中國形象。像東方主義展現出的那種缺乏歷史的社會，顯然無法產生世界性歷史事件。」^⑧德利克在這裏提到的東方主義的傳統模式自然值得我們警惕。但是，殊不知出於不同的政治文化偏見，中國作為西方的「他者」，可以是神秘的、落後的、靜止不變的

東方帝國，也可以是紅色的、革命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楷模。各種後現代主義的理論的確有助於揭示東方主義的神話，但是，如果批評家對自身的政治偏見不作批判性的思考，結果就很難避免東方主義的覆轍。

註釋

①②③④⑧ 德利克：〈世界資本主義視野下的兩個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10月號，頁7-9；6；7；12-14；4-5。

⑤ 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4月號，頁21-34。

⑥ Fredric Jameson, "Periodizing the 60s", in *The Syntax of History*, vol. 2 of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180.

⑦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Chinese Socialism", in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ism*, eds.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Armonk, N.Y.: M.E. Sharpe, Inc., 1989), 19.

德利克在分析西方社會詆毀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各種原因時，曾提到東方主義所扮演的角色，這自然值得我們警惕。但是，如果批評家對自身的政治偏見不作批判性的思考，結果就很難避免東方主義的覆轍。

郭建 北京師範大學畢業。1985年於美國康涅迪克大學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攻讀，後獲英文博士學位。現執教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白水校區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White-water)，講授英美文學。